

凌硕为◎著

新闻传播 与近代小说 之转型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 / 凌硕为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8-10954-3

I. ①新… II. ①凌… III. ①新闻—关系—小说—文
学创作—中国—近代 IV. ①I207.5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028 号

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

凌硕为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卢 川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4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954-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陈大康

这部书稿名曰《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它已概括了全书的内容，但为何如此命名，我感到还有必要在这里说上几句。

“近代”是沿用了史学上的概念，是指鸦片战争发生的道光二十年（1840）至清王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时间跨度共是72年。“近代”的两端各是古代与现代，而近代小说则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中介过渡环节。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面貌迥然不同，但小说的发展不可能突然间就面目全异，其间就是由近代小说承担了转换变化的重任。不过，小说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历史步入近代就立即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道光朝至同治朝，整个小说领域在前三十二年里一直在持续古代小说的发展态势，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直到同治末年新创办的《申报》开始刊载小说，而且是连载翻译小说，这种新因素的呈现才开始打破一切如旧的局面，此时距离清王朝的灭亡已只有近四十年的光景了，而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前后直至清亡，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里，小说的面貌与现代小说已渐至相差无几。因此，书名中的“转型”，表明作者关注的是从同治末年开始的那三十年，而“新闻传播”是当时中国新出现的传播形式，它也是导致当时小说面貌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显然，本书的书名在告诉我们，作者集中探寻的是该时间段内，新出现的传播方式，即报纸与刊物是如何促使小说逐渐向现代小说的方向前行。

综观近代小说的研究状况，可以知道作者选择了个颇有价值的论题。从研究的分布来看，近代小说研究中较热火的似是晚清小说板块，大家熟悉的作品，重要的事件多集中于此，人们的兴趣也就随之而至，再加上治现代文学者为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也多追溯至此。晚清时，小说创作的内容最丰富多彩，变化也最为激烈，于是有关该时间段小说研究著述就格外多。诚然，晚清小说之研究，无论如何应该成为近代小说研究中的重点。可是，当研究那时重要的作品与事件时，有一个问题就不该也无法回避，即那些重要的作品与事件为何会在晚清时发生，在此之前经历了哪些准备，保证能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又是如何逐一具备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晚清时小说发展并不会突然间呈喷发状。大

家都知道“蓄势待发”这句成语,若要将“发”论述清楚,我们能离开对“蓄势”的研究吗?如果说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中介过渡环节,那么这种中介过渡作用最典型的显示,就是本书集中论述的时间段。论题的价值已无可置疑,而由于种种原因,治近代小说者于此致力甚少,故而相关研究就更具有开拓性与迫切性。

然而正因为如此,本课题的难度又甚大。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可供参考的以往研究偏少,不像那些较热闹的区域,可认真研读已有的研究,或获得启发,或避免偏颇,而今一切都得靠自己的摸索,此其一也。这是一个较生疏的区域,并无现成的资料供研究选用,作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资料的搜集,其后的梳理与辨析亦非易事,此其二也。报刊是该时间段中国新出现的传播方式,它对近代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几乎已是常识。但它们的推动作用究竟是如何产生,这与当时那些报刊的经营者及编辑者的观念有何关系,其内部运作的具体方式、各项细节又如何?这涉及学科的交叉,相关的研究在以往虽然也有,但深入者不多,此其三也。如前所言,本书关注的时间段是近代小说转型的重要阶段,应如何把握转型的形态,归纳其中的特点与规律,这不像有毅力、能吃苦就可做好资料搜集工作那般,而是要求作者在理解与悟性方面有所提升。此其四也。有此“四难”,课题的完成就不可能是轻松的事,现在虽不能说作者将这些问题都已很好地解决,但凌硕为确实尽了自己的努力,而且还获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研究近代小说的著作与论文已有不少,那些著述中相关资料的引用常有较高的重复率也是大家熟知的现象,可是读者可以发现,在本书稿中所看到的大量资料都很新鲜,这本身就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惟有不畏辛劳枯燥,才能挖掘出如此多的第一手资料,而为了搜寻相关资料,凌硕为还特地南下香港,在图书馆内盘桓多日,最后终于满载而归。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凌硕为加深了对自己研究的理解,而经提升的理解,又反过来指导了他搜寻资料的方向与内容。譬如说,治近代小说者查阅当年报刊时,多关注其时的作品或与小说有关的资料,可是报刊上必刊载小说成为光绪二十年后的事。同治末年《申报》上曾刊载过小说,这在当时被经营者视为失败的尝试,故而只有短暂的闪现,《申报》重新刊载小说要等到三十年之后。自光绪初年起的二十年间,报刊刊载小说着实少见,可这并不能误解为办报者对小说的完全忽略,否则后来报载小说也不会在短期内就繁盛起来。凌硕为注意到,在这段时期内,报纸的新闻版上有许多介于新闻与小说之间的作品,诚如书稿中所言:“作为新闻,它们太琐屑、太富文采、不太真实;而作为小说,它们又太平实、太缺乏趣味。”这类作品的存在又具有普遍性,不仅上海的《申报》、《汇报》、《字林沪报》、《上海新报》都是如此,它们同时

也出现于香港的中文报纸如《香港中外新报》、《循环日报》上。这类作品有一定的新闻性,同时又含有相当大的虚构成分,它们实际上成了后来报载小说繁盛前的铺垫。从这一观念出发,那些不入治小说者之眼的作品被凌硕为——发掘,聚为一类,也颇为大观。显然,这类作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后来报载小说繁盛的理解,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也应是近代小说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是过去未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已。

凌硕为将这类作品命名为“类小说”,这是他对当时与小说有关的报载现象的概括,而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又将作者引入一个较陌生的领域,使他面对许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虽是困难重重,却也意味着作者获得了创新开拓的可能性。当对“类小说”现象作追寻时,就必然涉及这类作品的撰写者。他们是中国早期的报业工作者,在书稿中则是按习惯将其称呼为“报人”。对这些早期“报人”及其小说观的认识,主要还是得靠分析那些作品来形成。为了能有包含丰富细节的总体把握,凌硕为沉浸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细心地通过爬梳、排比、对照、联系等种种方式,努力体会报人的生存方式、思想、生活、情趣、爱好等,以及当时士林文气与社会风尚。在他的努力之下,原先许多单调的文学现象变得生动鲜活,许多看似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学作品变得充满内涵,许多似乎只是孤立的文学事件之间显示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凌硕为得出了自己的判断:“类小说”较普遍地出现,是由于“早期报人观念中新闻与小说界限的相对模糊”,“这一新闻观念的接受过程以传统的小说观念为媒介,而它又反过来对传统的小说观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的刊载逐渐规范,小说与新闻相混杂的情况越来越少,而在那过渡期间,报人及其创作的含有新闻叙事特点的“类小说”不仅填补了读者们的阅读空挡,而且还影响了后来作者创作观念与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这其中也包含了凌硕为在书稿中所说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西方叙事观念潜移默化地进入普遍的叙事观念(包括小说观念)之中的中介作用。

报人靠报纸而生存,报纸的发展则依赖于读者好恶的选择,于是报人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之间天然地具有密切的联系。单个的读者只能是创作后的评论者,而群体意义上的读者却是影响小说发展的重要摄动力之一。这一命题治小说者大多知晓,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于此却难以展开较充分的论述。报纸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近代报纸上时常可见读者反馈一类的文字。可以说,当时报人的创作是在读者反馈意见的制约下进行,凌硕为注意到报人与读者的互动问题,书稿也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而在最后的“结语”中,凌硕为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归纳:

近代报业在养成职业小说作家的同时,也培养了与近代传媒相适应的读者。由于观念的进步和技术的发达,报人与读者的联系更为密切,读者时

常可以在与报人的交流中对媒体的小说出版发表意见,参与到小说的产生和传播领域中,读者绝对的被动地位变成相对的被动。长期对报刊的阅读也在渐渐改变着读者的观念和阅读习惯,发达的传媒使读者与作者共同成长。而且不同类型的报刊拥有不同类型的读者,这分化了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体,而小说也得以针对不同读者群体进行相对定向的传播,这又为不同小说流派的并立创造了条件。

这段结论性的文字不长,但却是凌硕为搜集了大量资料,梳理辨析,又从不同角度,以及将对象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作比照与分析后所得,故而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精准判断,而这类判断在书稿中又并非少数。

“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是个大题目,它对于把握近代小说的发展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今后很可能成为近代小说研究中的“显学”,从整体上着眼,凌硕为的工作还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大家的探索,且须是靠毅力与韧性支撑的扎实推进,因为抓几条材料就扯出个框架大发议论将无济于事,反而会成为正常研究的干扰。我期待着这方面会有丰硕的成果问世,其中也包括凌硕为的继续努力。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近代报业与小说生产革新 ·····	(10)
第一节 申报馆小说生产的多样化 ·····	(10)
第二节 美查的经营对近代小说的意义 ·····	(20)
第二章 新闻生产与类小说的文体意义 ·····	(30)
第一节 类小说与典型新闻、典型小说的区别·····	(30)
第二节 类小说产生的根源：早期报人的观念转变·····	(36)
第三节 类小说的叙事特点 ·····	(44)
第三章 类小说的发展与转化 ·····	(55)
第一节 类小说的发展与报人的小说创作 ·····	(55)
第二节 报刊文体与小说资源的拓展 ·····	(63)
第四章 报人圈与小说情调 ·····	(72)
第一节 报人的传统情调与报人圈的形成 ·····	(73)
第二节 传统情调的变迁与报人圈的小说活动 ·····	(84)
第三节 早期报刊小说的转载与报人观念交流 ·····	(91)
第五章 报刊语境与志怪的异化·····	(104)
第一节 报人的志怪趣味与叙事观念·····	(106)
第二节 报刊志怪的文本形态与叙事方式·····	(121)

第六章 报人的选择与小说的沉浮·····	(136)
第一节 王韬小说的“游戏”·····	(137)
第二节 “孙韩会”的象征意义·····	(153)
结 语·····	(166)
附录 早期《申报》小说、类小说目录(同治十一年—光绪二年) ·····	(168)
参考文献·····	(196)

导 论

一、研究对象：中国报业和报人的产生

当西方的殖民步伐踏入远东时,欧洲的宗教、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随之而来,中国的报业在此推动之下也应运而生。虽然最早的中文报纸出版于东南亚的马六甲,^①但随着香港的割让和五口通商的实现,香港和上海相继成为中国的报业中心。报纸在中国创设之初,多为外文,如澳门最早的报纸《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创办于1822年,为葡文,香港最早的报纸《香港公报》(*The Hong Kong Gazette*)创办于1841年,上海最早的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办于1850年,俱为英文。第一份出版于中国的近代中文报刊是1853年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咸丰七年(1857),^②上海也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六合丛谈》。相对于20世纪的报界而言,当时的报刊种类及发行量可谓微不足道,但它们在当时以惊人的生命力迅速扩展壮大,并在潜移默化中给晚清中国的各个方面带来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与近代中文报业兴起相应的是中国报人的诞生。报人通常泛指新闻工作者,包括报刊的投资人(馆主)、经理、主笔(编辑、撰述)、访事人(记者)等。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报纸(如清代以前的“邸报”,清代的“京报”、“辕门抄”等),但它们只是为政府传递诏令奏章之类的文书,其从事者也只是政府中

① 1815年8月5日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已知最早的中文报纸。

② 晚清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中文报纸或以干支纪年,或以年号纪年,或以公元纪年,且大多数种并用,比较混乱,海外则多用干支及公元纪年。故本文涉及的时间,凡中国大陆范围内,民国(不含)以前标以年号纪年,并在括号内标注相应公元纪年,民国及以后则径用公元纪年,中国大陆范围外一律用公元纪年。引文内所用纪年仍其原貌,不另标注。

的官吏,并不成其为具有独立职业特征的报人。资本主义进入后,真正的报人才得以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不但刺激了社会对市场信息的需求,激发了知识阶层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愿望,而且为之提供了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报人改变了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成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的独立职业者,专门从事媒体工作,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新型知识阶层的文化人格和生活方式。

由于报刊类型的不同,从业报人也有所差别。就办报的宗旨而言,早期的中文报刊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传道为目的,进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如上文所提《六合丛谈》,又如创刊于同治七年(1868)的《中国教会新报》(其后身《万国公报》则开始向综合性新闻报刊转变)、创刊于光绪四年(1878)的《益闻录》。另一类以传播信息为目的,进而藉刊布新闻与广告以牟利,如创刊于1857至1858年间的《香港中外新报》^①、创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申报》。前一类报刊虽然数量不多,但创办者多有比较明确的传道目的,往往致力于宗教、文化和学说的传播,故其麾下的中国报人大多容易受到这些方面的更多、更直接的影响,进而成为西方文化、观念的积极宣传者,而且这种传道的精神和方式给中国士人以极大的启迪,从甲午到辛亥乃至民国,持各种思想和政见的人纷纷以报刊为工具宣扬己说,这种做法其实与早期的传教士一脉相承。后一类报刊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教、政治等目的,但商业利益驱使他们迅速膨胀,占领着报业市场的大部分。思想目的的缺乏使供职其间中国报人受西方的影响较少而又间接,更多本土文化得以占据版面,也正是因此,中西文化在这些商业性报刊上能够在缓慢的交流中逐渐找到默契,进而得以更深、更好地融合,它们使得许多西方的文化、观念“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融入本土文化的血脉之中,这反而是前者直接而激进的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报刊虽然各有宗旨,但最初的中国报人却多具有相似的背景。戈公振概括早期中国报人的来源时说:“当时社会所谓优秀份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此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②中国报业发轫之初,情形确实如此,寥寥数家报馆,聚集的多为中下层文人,多不得志于科举。如申报馆早期的一批主笔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等,都是屡试不第,进而绝了仕途之念而托身租界报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名主笔蒋芷湘,他幸运地通过了会试,便离开申报馆进入官场。晚清报界像蒋芷湘这样的幸运者可谓凤毛麟角,即使偶然出现也不会继续留在报界(官方办报除外)。以中下层

① 《香港中外新报》的创刊时间参考(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七章的相关考证。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文人为主的中国早期报人形成了晚清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处在报人的位置，却没有“无冕之王”的地位；他们供职于近代化的媒体，起初却对它并不熟悉；他们内心里真正根深蒂固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传统的趣味，传统的行为方式。当他们进入报馆的时候，近代中国中西文化、观念的一次直接的碰撞开始了，它既不像明代天主教士传教那样悄无声息，也不像义和团“扶清灭洋”那样轰轰烈烈，它像前者一样平静，又像后者一样意义深远。各种各样西方的知识、思想、观念以报人为中介进入中国，而惯于嵌入雕板的中国传统知识、思想、观念也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铅活字排成的报版，早期的报人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项调和中西的艰巨任务，而他们的自我调整则首当其冲，因而在中西交会之中，他们既是其中介，也是其缩影。

正是由于如此特殊的地位，报人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已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而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报人的作用同样十分关键。

其一，他们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传播方式，可以决定是否刊行小说，刊行怎样的小说，以何种形式刊行，从而在传播环节上对小说的创作进行间接的引导。

其二，晚清的报人能够更多更早地接触西方的思想（在华办报的西人则已经拥有了比较先进的知识和思想），因而往往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且从维新运动中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加入报人的行列中开始，报人就不仅仅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同时也成为先进思想的生产者。他们通过报刊进行思想传播，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恰恰构成许多晚清小说家的知识和思想背景。

其三，比起生活在书斋的普通的文人，身处近代传媒机构中的报人会更多、更直接地受到西方观念的洗礼，他们传统的小说观念最早受到西方新闻观念、文学观念的影响，从而发生转变。他们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中西叙事的结合，在实践中逐渐调整着传统叙事，形成新的叙事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报馆可以看作近代小说转变的一个策源地。

其四，报人在小说观念的传递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他们通过刊载新式的小说作品（包括翻译小说），把新的小说观念传递给读者；其次，他们对小说的选择和评论使他们的小说观念迅速而广泛地传递给读者，其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为此前的小说评点所无法企及；再次，他们往往有着广泛的交际，通过社交活动也可以直接地传递他们的小说观念，这是传统深坐书斋的文人所相对缺乏的条件。

其五，当晚清的政治运动家转入报界成为报人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向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进行启蒙，或者是向他们宣扬和灌输自己的思想

和政治主张,通俗小说就被选择担当起这个重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小说的新使命和新功能使这种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它甚至成为报人进行党派论战的工具。

其六,不少报人本身就是小说家、小说翻译家、小说评论家或者小说爱好者,他们直接进行小说创作、翻译和评论,对小说的新的题材、技巧等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有的还创办了专门的小说期刊,从过去个人的摸索转变为群体的探索,并将探索的成果迅速传播,这大大加速了小说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近代小说研究的升温,报人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小说界革命及此后活跃的报人小说家(如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等),而对活跃于小说界革命之前的报人小说家(如王韬、邹弢、韩邦庆等),研究则相对较少,至于小说界革命之前活跃于报坛,对小说多有提倡而自身却几乎没有小说创作的报人(如美查(Ernest Major)、钱昕伯、蔡尔康等),则鲜有小说研究者问津。究其缘由,主要因为小说界革命之前的报人小说家作品寥寥,而他们的小说形式往往比较传统,缓慢的进步又不幸被梁启超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声势所掩盖。

如果仅从量上考量,小说界革命前报人的小说创作确实远远不及此后的,但小说的发展绝不仅仅体现于创作的数量,而小说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也不仅仅是数量积累的结果。早期报人的小说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现代转变,比如王韬已经接受申报馆的稿酬而进行《淞隐漫录》的创作,并在《点石斋画报》连载,韩邦庆则自办期刊发表自创小说,稿酬、文学期刊这些因素在20世纪的小说发展中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较少或没有创作小说的报人同样不应受到忽视,因为小说发展的动力并不只有小说创作。美查对文化产业的经营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先例,他所倡导的西方小说的译介更是开风气之先,在他麾下,蒋芷湘等人编辑《瀛寰琐记》等文学期刊,为小说提供新的载体;钱昕伯等人整理出版了大量传统小说,一时掀起小说的热潮;蔡尔康在《字林沪报》连载小说被后人追认为小说入报之始。^① 这些报人虽未留下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但他们对小说史的影响,恐怕还在20世纪一些高产小说家之上。如果说个别报人的作用毕竟有限的话,那么早期报人作为文人群体的作用则更应受到关注。传统小说观念与西方新闻的交会就发生于中国第一批报人的笔下,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接受过程中,西方的叙事方式被逐渐吸收到传统小说叙事之中,而报人身份也渐渐融入传统小说家的身份,对现实的关注由此大大地增强,小说叙事的革命性转变就在潜移默化中酝酿。可见,近代小说的发展并非仅仅由几个杰出的小说家所造就,蔚为大观的报

^① 参见孙玉声:《报海前尘录·小说入报》,《新夜报》,1934年4月20日。

人群体的作用不容低估,而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尤其如此。

申报馆报人的小说活动在小说界革命之前极具代表性。《申报》虽然不是晚清的第一家报纸,甚至也不是中国乃至上海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但它却是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内地鹤立鸡群的大报,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报纸能与之形成长时间真正的竞争,以至于“申报纸”在上海当时几乎成了“新闻纸”的代称。与此相应,申报馆的报人也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特殊的身份使之拥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并与报业比较成熟的香港报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沪报》、《新闻报》等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报纸最初都是由脱离申报馆的报人支撑起来的。可以说,申报馆的人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 19 世纪整个上海报业(它又是当时中国报业的中心)的发展。因此,早期申报馆的报人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中国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申报馆报人对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出版了大量小说,书籍、报纸、期刊、画报等各种载体都有小说刊载。在西方小说的翻译、报纸和期刊对小说的连载、小说稿酬的实行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创举。

因此,本文将以小说界革命前的早期中国报人为对象,探讨他们的报业活动、小说创作,以及他们的生活、观念、思想、情感如何对近代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将以早期申报馆报人为论述的中心,连带其外围文人群体,并兼及其他较有影响力的报人。

二、研究方法:小说观念的考索

小说史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进程,仅仅勾勒几部杰出的作品固然无法展现其真实面貌,而大量作品所呈现出的小说史的表象也不完全是研究的终点,因为在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有着实在的创作主体,以及具体的生产过程,而社会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它们。要理清如此复杂的结构当然绝非易事,但以此作为研究的方向应该能够更贴近小说史的真实。本文就试图通过对早期报人的社会活动和小说创作的研究,发现小说作品背后所发生的小说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此,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一)报人的职业特征

在小说史研究中,小说作者作为小说家的一面常常受到格外的关注,这当然是研究的需要,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抽象的小说家,小说的作者在社会是一个多面人,除小说家以外的其它角色也是构成其完整人格的重要方面。只有各方面的统一才能成为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而其各个方面也在统一之中相互影

响,对一个小说作者来说,这种影响有时显得格外突出。

晚清许多小说家都是报人。报人身份不仅带来更多的经历和更广的见闻,更意味着内在观念的重新整合。对于晚清早期的报人而言,报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行业,而新闻更是完全陌生的叙事形态。为了理解这一陌生的事物,报人不得不在固有的传统观念中寻求参照,小说就是参照物之一。早期的报人在论及新闻时经常与小说相比附,《虞初》、《齐谐》、《搜神》、《志怪》等小说名称在阐述新闻和报纸的文章中比比皆是,“稗官”、“寓言”、“奇闻”、“轶事”等经常用于描述小说的词也时常在此类文章中出现。在具体的表述中,小说往往被当作理解新闻的起点,而新闻则常常被描述成对小说的延续、提高和修正。早期报人观念中新闻与小说界限的相对模糊导致了报纸中叙事形态的混杂,既有比较典型的新闻,也有比较典型的小说,更有许多文章的形态介于新闻与小说之间(本文中暂命名为“类小说”)。这一新闻观念的接受过程以传统的小说观念为媒介,而它又反过来对传统的小说观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仅影响到少数几个报人小说家,实际上这可能已经成为当时报人的普遍观念,并以他们为中介广泛地渗透到社会中,新闻的叙事特点,以及许多来自西方的叙事观念由此潜移默化地进入普遍的叙事观念(包括小说观念)之中。由于最初发生于报人的观念转变能够以报纸为媒介被广泛地接受,从而逐渐成为社会观念的一部分,因而可以长久地保持和传承。尽管随着新闻的规范化,新闻与小说相混杂的形态大为减少,但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于新一代小说家的观念中。

报人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新闻工作方面,由于媒体的特殊性,他们的其它工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方式之一是征书或征文。在征集过程中,报人所提出的标准将以先进的近代媒体为依托,成为强势的话语,对社会风气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同治十三年(1874),申报馆发出告白“搜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①,短短数年之中,大量流传未广的小说被投寄到申报馆,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形成晚清小说出版的一个高峰。光绪二十一年(1895),傅兰雅先后在《申报》、《万国公报》和《中国记事》上刊登了《求著时新小说启》,要求针对鸦片、时文、缠足三弊“撰著新趣小说”^②,结果共收到作品162件,虽然傅兰雅本人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但它毕竟开创了小说征文的先例,傅兰雅对小说的主题、功能、形式等问题的观点也通过征文传向社会,并得到了一定的响应,韩南甚至认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

① 《本馆告白》,《申报》,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1874年11月13日)。

② 《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1885年6月14日)。

说的总体方向”^①。方式之二是报人之间以及报人与读者之间的交往。近代报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之间传统的交往方式,先进的传媒使报馆成为新的社交中心,报刊中开辟出文人间投赠、唱和的公共空间,大大拉近了文人之间的距离,更容易形成庞大的文人群体,而报人则因其特殊的地位而俨然成为文坛盟主。在这种新型的文人关系中,处于交际圈中心的报人的意见能够迅速在较大范围中产生反响,从而形成风气。晚清狭邪题材小说的盛行就与报人对“品花”的热衷不无关系,报纸作为“品花”的公共平台,可以获得广泛的参与,虽然只有少数“花国领袖”主导着这一活动,却有数以万计的读者同时共享这一娱乐话题。这种大众活动的长期盛行促进了作家对狭邪生活的更多关注和深入体察,也使“嫖界指南”式的叙事成为大众的需要。

在晚清,报人的影响力总体上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小说家,不但报人小说家的报人身份对其小说家的身份产生影响,即使非小说家的报人,其活动也可能以种种方式间接地对社会的小说观念产生影响。报人在小说观念发展中的这些作用以往较少为研究者所注意,它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小说的概念

在近代小说史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大多都被限定在白话通俗小说,传统形式的文言小说鲜有涉及,即使提到也往往没有将其作为小说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徐枕亚等人以文言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许多小说史的叙述中,地位倍感尴尬。

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客观原因是20世纪初新小说倡导者大多以普通大众为理想读者,强调小说的启蒙作用,而他们以白话创作的通俗小说又大获成功,成为一时风气,以至白话的通俗小说几乎成为新小说的特定形态。相形之下,文言小说的声势自然远远不及,而且新文化运动后白话的主流地位被进一步巩固,此后的小说发展很难找到与晚清文言小说的有机联系。

深层的主观原因则根源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维定式。^②在以西方文学观念批评和研究中国小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西方的小说概念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以西方的小说概念来衡量,白话的通俗小说基本上都能符合标准,而文言小说集中只有情节比较丰富,结构比较完整的传奇

^① [美]韩南:《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② 参见刘勇强:《一种小说观与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体小说才能符合,杂处期间的情节简单,结构琐碎的志怪、杂俎就难以符合,而为数甚巨的文言笔记则几乎全被摈诸门外。

以这种观念为指导来勾勒晚清小说发展的图像,就会发现小说界革命以前小说创作和出版十分冷落,而小说界革命开始后却骤然出现小说繁荣的局面,而且白话通俗小说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这种想象并不符合晚清小说发展的实际,与小说界革命前的真实情形更有着巨大的差距。

韦勒克和沃伦就指出:“历史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写,这些价值系统则应当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①文学现象如果脱离了其存在的具体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就很难被正确地认识。因而,在考察晚清小说的发展之前,很有必要首先厘清晚清的小说观念及其由来。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汉书·艺文志》将小说著录于诸子略下的小说家类,并在小序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②这些关于“小说”的论述虽然并不是针对小说文体,但它们为后世的小说观念定下了基调。六朝的志怪和唐代的传奇文原本并不属于小说,它们在唐代与六朝以来的杂录体小说合流,形成新的小说文体,一直延续到清代。宋代以降盛行的笔记,文体形态比较模糊,或被著录于史部,或被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分类上没有确定的归属,一般都径称为“笔记”,而清代也常常以“小说”称之。白话小说源于宋代的说话及其话本,此后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通俗小说,而长篇的章回体和短篇的所谓“拟话本”为其大宗。中国小说的源流可谓极端复杂,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小说概念。

清代小说概念的外延相当宽泛,上述各种不同的小说类型在清代虽然也各有专名,但都可以“小说”称之。清代流行的“说部”一词似乎更能概括这种杂糅的小说概念,它的外延大致与“小说”相当,也包括上述各种形态,而其字面意义更强调在传统文类中蔚为大观的小说的独立性,也意味着对其内部的不同形态更强的包容性。在晚清,“小说”与“说部”二词几乎可以通用,而指涉范围更广,开始用来翻译英语中的 novel、story、fiction 等词,这些西方文体中的一些因素也随之进入晚清的小说概念之中。

可见,晚清人观念中的小说与今人有很大的差别,总体上要宽泛得多。虽然当时的小说概念内部也有形态的分别,但既然都被通称为“小说”或“说部”,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小说的各种形态仍有着内在的联系。关键在于,晚清小说观念的发展是发生于晚清人的意识之中,建立于他们原有的小说观念之上,因而,以今人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6—297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97年版。

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小说观念去强行裁剪晚清小说,则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如果以晚清人动态的小说观念为参照,所呈现的小说史图像就将与前文所述大相径庭,小说界革命之前尤其突出。19世纪中期,小说家对《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模仿余兴未了,而内容丛杂的笔记最为流行,^①白话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的创作依然维持每年1至2种的速度。^②《申报馆丛书》的征集出版使小说的出版骤然升温,同时也刺激了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创作,在同光之际掀起了一股小说热。在中文报刊产生之后,文言小说获得了新的发表途径,十几年来中一直在报刊的新闻版中占有一席之地。西方小说开始被零星地翻译,专门的小说期刊也开始被尝试,而19世纪末兴起的小报则更热衷于通俗小说的刊载。

从以上对小说界革命以前晚清小说发展最粗率的勾勒中可以看出,虽然今人观念中的小说在当时比较落寞,但晚清人观念中的小说却颇为繁盛,旧的形式仍为社会所热衷,新的形式也方兴未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因而,小说界革命前的这段小说发展史其实相当精彩,且富有活力,绝不能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暗淡背景而被轻易忽略。而它的精彩和活力又与近代中文报业的兴起和报人的产生有着密切联系,对报人的深入研究正可作为探寻中国小说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条线索。

总之,本文将以报人的职业特性和晚清的小说观念为突破点,力图还原出小说界革命之前近代小说转型的实际图像。在外部形态上,报人的职业特性可以归纳为新闻传播,报人林林总总的活动大都围绕它而进行;而在内在观念上,小说也不再是个别的一部部作品,它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既有理性的认识,也包含着非理性的情感、爱好、趣味等,概括为一种情调似乎更贴近于它在晚清报人观念中的模糊形态。本文将从内外两方面分析新闻传播和小说情调的相互作用,以探讨这段较受忽视的小说史中的一系列问题。

① 参见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第四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中的统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